

萧梁藏书机构考论

陈德弟

摘要 我国南朝时期的梁朝,官府藏书事业兴旺发达,藏书数量巨大,藏书处所众多,所编新型图籍颇具影响,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通过考论这些藏书机构,不仅可以感知萧梁政府对藏书之重视,而且还能明了其重视之原因。

关键词 梁朝;藏书机构;梁武帝;文化政策

分类号 G256

Abstract During the Liang dynasty,feudal government book collection has obtained great development. A huge number of books many collection agencies and new books made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se collections agencies,not only can sense the attention to book collection of Xiao Liang government,but also can understand the reason of its attention.

Keywords Liang dynasty;Collection agency;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Cultural policy

Class Number G256

我国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替,社会动荡不止。与北朝相比,南朝相对安定,特别是梁武帝治下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藏书事业勃然而兴,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传承中华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西晋末期,中原板荡,五胡纷争,藏书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晋室南迁,许多士人负帙担书,过江发展,将先进思想、制度和典籍文化带入了南方。《隋书·牛弘传》称:“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在此背景下,梁朝乘势而为,广聚图籍,充实官藏,从而开创了南朝藏书文化的新局面。

梁朝官藏是在宋、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刘宋元徽年间,其官藏有 15074 卷^[1],至齐武帝永明时,增至 18010 卷。^[2]梁武帝起兵灭齐,入京城后,即刻“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3]与前朝帝王一样,梁武帝一登基,就立即颁征书令,求天下遗书,道:“今虽百度草创,日不暇给,而下车所务,非此孰先!便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缺,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以便施行。”^[4]在其号召下,域内藏书之家,

纷纷向政府献书,梁朝官藏增长很快。天监四年(505),其藏书达 23106 卷^[5],迄武帝末,增至八万余卷,这还不包括侯景之乱所焚之书。^[6]武帝之子元帝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嗣位,继续求书,不久达十四万卷^[7],居南朝官藏之冠。梁人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说:“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8]《隋书·经籍志序》亦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在此状况下,梁朝设置了多个藏书处所,庋藏图籍,现一一考述如下:

1.1 秘书省(或称秘阁),它是由东汉秘书监发展而来的。唐杜佑《通典·职官八》“秘书监”条载:“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文帝黄初初,乃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掌艺文图籍之事……晋武帝以秘书并入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惠帝永平中,复别置秘书监,并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宋与晋同,梁曰秘书省。”自汉魏以来,秘书监(省)是国家所设立的最高藏书管理机构 and 主要的藏书处所,主要负责图书的收聚、庋藏、整理、编目、流通、

利用等事务。梁朝秘书省的职能亦如前朝,其最高长官称秘书监,副职为秘书丞,下设秘书郎、著作郎、撰史学士等人员。《隋书·百官志上》载:梁秘书省“掌国之典籍图书……梁初周舍、裴子野,皆以他官领之。”

1.2 文德殿,梁朝主要宫殿之一,梁武帝为与士人从事文化活动,“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梁书·王规传》载:“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又《陈书·张讥传》载:“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敕令论议。”武帝之子简文帝在殿内设立了学士省,专门安置文学侍臣,令其待诏,以备蓄用。《南史·庾易传附子肩吾传》载:“简文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可见文德殿不仅为藏书处所,还是校书、著述之地。

1.3 华林园,六朝著名宫苑,建于台城内建康宫之北隅。刘宋时扩建,于园中筑山造楼,建殿起堂,齐、梁诸帝常于此听政集宴,并邀学者赋诗属文、讲学编书。《梁书·何点传》载:“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高祖甚悦,赋诗置酒,恩礼如旧。”同书《贺玚传》载:“天监初,复为太常丞,有司举治宾礼,召见说《礼》义,高祖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又《刘杳传》载:“詹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书成,以本官兼廷尉正。”武帝崇佛后,官藏佛典迅速增加,于是辟华林园“集释氏经论”,高僧释僧绍编成《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后沙门释宝唱再编华林园所藏佛典为《梁世众经目录》。华林园不仅是藏书之所,还是编书讲学、赋诗娱乐之地。

1.4 尚书阁,即尚书省,它是国家主要行政机构之一。最高长官称尚书令,副职有左、右仆射,下有庞杂部门,署僚众多。在政府行政部门储藏图籍,秦汉已行之^[9],南朝沿袭。梁朝尚书阁所藏“经史杂书”,可能为处理繁杂政务做参考,如遇疑难案件,从这些“经史杂书”中寻求处理方法。

1.5 西省,东晋南朝官署,设在宫禁中,初为禁军将领值宿处。晋“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武官主书于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诏诰,住西省,因谓之西省郎。”^[10]梁朝时西省逐渐成为庋藏书籍、学士校书、著作等学术机构。《梁书·刘峻传》载:“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同书《殷钧传》载:钧为秘书丞,“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

为品目。”又《王僧孺传》载:僧孺“入直西省,知撰谱事。”《孔子祛传》亦载:“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梁官》,启子祛为西省学士,助撰录。”另外,《梁书·任孝恭传》中记道:“高祖闻其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著作撰史,均需参考书籍,因此,西省成为梁朝重要藏书处所之一。

1.6 寿光殿,梁朝主要宫殿之一。梁武帝亦常于此会见文人,并从事一些文化活动。《梁书·皇侃传》载:“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拜员外散骑侍郎。”同书《刘苞传》载:苞“为太子洗马,掌书记,侍讲寿光殿。”《刘孺传》亦载: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尝于御坐为《李赋》,受诏便成,文不加点,高祖甚称赏之。后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同时,在此又建寿光省,与文德省功能相同,并设寿光学士、司文义郎等职,负责编书等文务。《梁书·张率传》载:“俄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同书《陆云公传》载:“缙至都掌选,言之于高祖,召兼尚书仪曹郎,顷之即真,入直寿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又《陈书·周弘正传》载:“普通中,初置司文义郎,直寿光省,以弘正为司文义侍郎。”编书自然需要藏书,因此,这里也就成了宫内藏书处所。

1.7 东宫,太子所居之处。因梁太子皆好学喜书,勤于著述,所以他们多聚图书,成为宫内重要藏书处所。《梁书·昭明太子传》载:“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有也。”萧统正是凭借丰富的藏书,著出《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编辑《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其所编《文选》影响甚大,以致形成“选学”。萧统卒后,晋安王萧纲立为太子,继续在东宫藏书、著书,从事文学研究,学者刘遵还为其藏书编了《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11]

1.8 国子学(或称太学),这是梁朝的最高学府,天监四年(505)建立,其最高学官为国子祭酒,下有国子博士、《五经》博士、太学博士、国子助教等教官,从祭酒到助教均有教学职责。国子学中汇聚了莘莘学子,许多儒学大师在此任职教授,政府提供饩廩。作为国家最高学府,为了教学需要,其藏有图书当属自然。《梁书·张充传》载:“征拜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充长于义理,登堂讲说,皇太子以下皆至。”张稷、明山宾、殷钧、萧子显等先后担任过国子祭酒官。《梁书·徐摛传》载:“起家太学博士,迁左卫司马。”朱异、贺琛、何思澄等先后担任过太学博士。而国

子助教是国子学中职位最低的学官,是《五经》博士的助理,一旦有所成就,便可晋升《五经》博士,他们各有专攻,并常常登坛宣讲。《梁书·孔奭传》载:“历官国子助教,三为《五经》博士。”国子学所藏书籍以经书为主,兼及其它。

1.9 东阁竹殿,它或许是宫内特大藏书处所,建于湖北江陵。梁元帝听政江陵后,遣大将王僧辩破平侯景,将建康劫余八万卷图书运抵江陵,使其藏书至十四万卷,这些书籍均藏于东阁竹殿^[12],其建制究竟如何,因史籍阙载而不可详考。

上述藏书处所的设立,为保存、传承中华典籍做出了贡献。不仅如此,萧梁政府对这些藏书还屡加整理,并编制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藏书目录,主要有《梁天监四年书目》四卷、《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四卷、《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华林佛殿众经目录》、《梁世众经目录》等,为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做了十分有意的探究。

2

萧梁藏书事业如此兴旺发达,究其原因,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个人经历和爱好有关。在我国封建社会,一个帝王的治国理念和爱好,可以直接成为国家的方针政策,从而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梁武帝在宋、齐时期,亲身经历了宋、齐暴君草菅人命的酷虐和宋、齐宗室遭滥杀的惨况,他执政后决定施以宽政^[13],极力主张以文治国,他儒、佛并用,以儒治国,以佛理心。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基础,只有统一的信仰,注重教化,广聚坟籍,修身养性,才是兴国之方,固国之本。他不否认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深知法律毕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底线,其约束人们违规行为很有限。他更注重“治心”,认为只有礼仪音乐、因果报应等教化能够治理人心,能够使上下行政者自觉和有所畏惧,能够提升百姓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人人自觉遵守普世认同的、安定的生活准则,国家自然就安定了。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所以梁武帝多策并举,从制度、教育、用人等各个层面,不遗余力地建设文教事业,全面实施以文治国的方略。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礼具有法的性质,儒家的繁礼缛节,佛教的轮回报应学说,均从灵魂上将人们束缚起来,这种不可见的约束力比成

文法的力量还大,梁武帝深知这点,所以梁朝建立之后,他立即着手健全各种礼仪制度,亲自参与修订了按照儒家体系构建的国家各种礼仪^[14],即所谓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15],敕学者大规模地整理礼书,自天监六年至十一年(507—512),由学者徐勉领衔,共整理礼书 1176 卷,至普通五年(524)才“缮写校定”^[16],然后颁布天下。

为了以文治国,梁武帝恢复了废止已久的国子学,以培养主政的文臣。天监四年(505),他颁诏说:“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17]学成后即除为吏。之后,为了尽快培养出适合文治的人才,他以极大的勇气,突破魏晋以来取仕凭门第观念的束缚,不论世庶子弟,只要有才清廉,便与登用。天监七年、八年,他先后两次颁诏,要求广延学子,量才录用。七年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稼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宜大启庠敷,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18]八年又诏:“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闻辟馆,造次以之……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19]《隋书·百官志》赞道:“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指梁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正因为如此关注教化,迫切需要文吏,所以就极大地调动了世人读书、藏书、就学的热情。在劝学过程中,梁武帝还数幸国子学,亲临讲肆,策试士子,赏赐有加。《梁书·武帝纪中》载:天监九年(510)三月,“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同年十二月,他再次“舆驾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这对世人藏书就学受教,起到了鼓励和鞭策作用,同时,也为官藏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不仅如此,梁武帝在京师还先后设立集雅馆和士林馆,以配合《五经》馆招徒授业,研讨学术。《南史·武帝纪上》载:天监五年(506)“置集雅馆以招远学”。《五经》馆和集雅馆皆为招收庶族子弟而设立。晚年,他又“于宫城西立士

林馆,延集学者。”^[20]士林馆是真正的研究院,许多学者到此讲学论难。《梁书·朱异传》载:“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儒宗周弘正亦“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焉。”^[21]这些学馆的设立,将士人引向读书研学的衢道,全面推动了梁朝藏书文化的发展,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就诞生在学馆中。

为了以文治国,梁武帝破例选拔了一批文彦才俊。如袁峻、周捨、周兴嗣等人,皆因高才文美而被超擢。在《梁书·文学传序》中,详录了武帝以文取仕的情况:“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如此提擢具有很强的激励性,它在世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优为吏成为世人追逐的目标。

梁武帝将佛教奉为国教后,他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僧官制度,在宫廷中开设道场,亲讲佛法,号召大译佛经,编纂佛籍,广建佛寺,皆诵佛典,一时间整个梁朝佛光普照,皈依佛门者众多。^[22]据《续高僧传》中的《僧伽婆罗传》和《求那毗地传》记载,天监五年至十七年(506—518)间,梁武帝敕命僧伽婆罗于寿光殿先后译出佛经十一部,共四十八卷。梁武帝还用了六年时间,在二十位高僧协助下,亲自撰成《大品经注》五十卷。^[23]正如《梁书·韦叡传》所云:“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梁武帝不仅藏佛籍,讲佛理,还多次舍身寺院。据《梁书》和《南史》本纪记载:大通元年(527)三月,“舆驾幸同泰寺舍身”;中大通元年(529)九月,“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升讲堂法坐,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三年(531)十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槃经》义”,十一月,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五年(533)二月,“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太清元年(547)三月,“帝升

光严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慧经》,舍身。”他身披法衣,布道说法,俨然菩萨皇帝,他即当“人主”,又做“法王”,借助佛理,以助儒术治国。这样,佛经如井喷般涌现,他不得不辟华林园“集释氏经论”。

梁武帝不仅是贵学重教的倡导者,而且还是躬行垂范的践行者。在图书文化上,他作范垂法,以为世则。他酷爱书籍,著述等身,多才多艺^[24],其子萧绎说他“始在髫发,便爱琴书,容止进退,自然合礼……登于晚年,探赜索隐,穷理尽性,究览坟籍,神悟知机。读书不待温故,一阅皆能诵忆,所以驰骋古今,备该内外,辨解联环,论精坚白。”^[25]武帝自谓:“朕本自诸生,弱龄有志,闭户自精,开卷独得。九流《七略》,颇常观览;六艺百家,庶非墙面。虽一日万机,早朝晏罢,听览之暇,三馀靡失。”^[26]《梁书》本纪亦载其“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从其所著篇籍来看^[27],他不仅精通经学、史学、佛学,而且在兵学、诗赋、医药、阴阳、占候、书法、棋艺、骑射等领域,也造诣颇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在梁武帝以文治国的引导下,带动了域内炽盛的藏书、读书、著书,从而使萧梁官藏事业兴旺发达。

参考文献:

- [1](清)严可均.全梁文:卷66:七录序附《古今书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4[M].北京:中华书局,1958:3347(下引此书版本皆同).
- [2]同[1].
- [3](唐)姚思廉.梁书:卷1武帝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3:13(下引此书版本皆同).
- [4]全梁文:卷42:为梁武帝集坟籍令//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3192.
- [5]同[1].
- [6](唐)李延寿.南史:卷80:侯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14(下引此书版本皆同).
-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65:梁纪二十一·元帝承圣三年(554)[M].北京:中华书局,1956:5120.
- [8]同[1].
- [9]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 [10](萧梁)沈约.宋书:卷60:王韶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25.
- [11](唐)魏征.隋书:卷33: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991.
- [12]同[7].
- [13]《梁书》:卷53《良吏传序》:765。(下转第66页)

等多处火灾,文渊阁也受到波及。火灾过后,为防再遭不测,世宗命人将文渊阁部分藏书转移到古今通集库及皇史宬贮藏;万历二十五年,文渊阁又经受了一场火灾,但这次火灾虽烧毁了文渊阁中的西制敕房,而东阁及其藏书则安然无恙。

由此可见,明代文渊阁发生火灾的次数是相当频繁的。应该说,这些火灾造成的损失并不太大,但文渊阁的防火措施十分薄弱,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北京文渊阁藏书的最终毁灭,有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历史因素,其结局之凋零,令人叹息。但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文渊阁在遭受甲申之变的农民军炮火之前,其损失散佚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是藏书管理工作的制度缺陷及具体管理工作的不完善。客观地说,明代文渊阁在藏书的收集、图书目录的编排与应用工作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相当有益的借鉴;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文渊阁的图书管理存在着严重缺陷,这是造成文渊阁图书散佚的最重要的原因。如何建立健全图书管理制度,做好具体的图书管理工作,不仅是明代文渊阁藏书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更是我们现代图书管理者所应高度重视的大问题。

参考文献:

- [1](明)夏原吉,等.明实录:卷二十[M].台北:“中央研究院”,1961:287.
- [2](清)张廷玉.明史:卷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43.
- [3](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四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总第597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859.
- [4](明)姚福.青溪暇笔:卷上:《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67册:641.
- [5](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总第868[M].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62.
- [6]王国强.明代文渊阁藏书考述[J].图书与情报,2002(2):35.
- [7](清)张廷玉.明史:卷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44.
- [8](明)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总第675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114.
- [9]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4.
- [10]张升.《文渊阁书目》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3.
- [11]同[6]:37.
- [12](清)张廷玉.明史:卷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43.
- [13](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总第443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39.
- [14]同[10]:124.

作者简介:

刘 震(1960.12—)女,馆员,山东大学图书馆,济南,250100;
康亦农(1962—),男,馆员,山东大学图书馆,济南,250100.

(上接第58页)

- [14]详见《隋书》中的《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等。
- [15]《梁书》卷3:《武帝纪下》:97.
- [16]《梁书》卷25:《徐勉传》:382.
- [17]《梁书》卷48:《儒林传序》:662.
- [18]《梁书》卷2:《武帝纪中》:46.
- [19]同[18]:49.
- [20]同[15]:87.
- [21]《南史》卷34:《周弘正传》:898.
- [22]《南史·郭祖深传》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凡亡其半。”
- [23]《全梁文》卷6:《注解大品经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2983.
- [24]陈德第.梁武帝才略说[J].文史杂志,2009(4).
- [25](梁)萧绎.金楼子:卷1:兴王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6](梁)萧统.文选:卷36:天监三年策秀才文[M].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6:1661-1662.

- [27]《隋书·经籍志》所录梁武帝著作有:《周易大义》21卷,《周易讲疏》35卷,《周易系辞义疏》1卷,《尚书大义》20卷,《毛诗发题序义》1卷,《毛诗大义》11卷,《礼记大义》10卷,《中庸讲疏》1卷,《制旨革牲大义》3卷,《乐社大义》10卷,《乐论》3卷,《钟律纬》6卷,《孝经义疏》18卷,《孔子正言》20卷,《通史》600卷,《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690卷,《老子讲疏》6卷,《梁主兵法》1卷,《梁武帝兵书钞》1卷,《梁武帝兵书要钞》1卷,《金策》30卷,《围棋品》1卷,《棋法》1卷,《梁武帝所服杂药方》1卷,《梁武帝集》26卷,《梁武帝诗赋集》20卷,《梁武帝杂文集》9卷,《梁武帝别集目录》2卷,《历代赋》10卷,《梁武帝净业赋》3卷,《围棋赋》1卷,《梁武帝制旨连珠》10卷.

作者简介:

陈德第(1958—),男,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所,天津,300071.